臺大中文學報　第四十期
2013 年 3 月　頁 331~366
臺 灣 大 學 中 國 文 學 系

屈萬里先生之經學文獻學初探

趙　飛　鵬*

提　要

屈萬里先生（1907-1979）爲臺灣當代重要學人，被譽爲「臺灣經學研究的領航者」。其治學範疇寬廣，於經學、史學、古文字學、圖書文獻學皆有專門著作行世，影響深遠。而其圖書文獻學之研究，實爲經學研究之基礎。本文嘗試以《屈萬里先生全集》及《屈萬里先生文存》所見之資料，分爲版本目錄、石經考辨、民俗解經等三個子題，初步梳理屈先生在經學文獻學方面之成就與貢獻，敬申景仰前賢，啓迪後學之意義。

關鍵詞：屈萬里、經學研究、文獻學、當代學人、臺灣

本文於 101.10.30 收稿，102.02.27 審查通過。
＊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Studies of Classical Documents by Qu Wan-li

Chao Fei-Peng*

Abstract

The *oeuvre* of Qu Wan-li (1907-1979) covers classics study, ancient history, ancient characters, bibliography, and so on. Qu Wan-li,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odern scholars, is a celebrated pioneer of classics study in Taiwan. This paper aims to examine his studies of bibliography, stone classics and folk custom so as to celebrate his contribution.

***Keywords*: Qu Wan-li, classics study, bibliography, mordan scholar, Taiwan**

* Associate Professor,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,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.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屈萬里先生之經學文獻學初探*

趙　飛　鵬

一、前　言

屈萬里先生（1907-1979），字翼鵬，山東省魚臺縣谷亭鎮人。歷任山東省立圖書館編藏部主任（1932-1939）、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主任、館長（1966-1968）、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所教授兼系主任（1968-1973）、中央研究院院士兼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（1973-1978）等重要職務。[1] 由於屈先生曾於民國二十八年（1939）擔任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孔德成先生（1920-2008）的文書主任，國民政府播遷到臺灣後，孔先生亦在臺大中文系任教，因此與屈先生成爲終身摯友。

屈先生爲臺灣當代重要學人，生平治學之主要範疇爲經學、上古史、古文字學、版本目錄學等，皆有專門著作行世。民國六十一年（1972）先生榮膺中央研究院院士時，其當選之理由即爲「對先秦史料之考訂，中國古代經典（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易》等）及甲骨文之研究，均有成就。尤精於中國目錄、校勘之學」。[2] 民國六十八年（1979）2 月，先生逝世後，其門生編纂遺

* 本文爲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「屈萬里先生之版本目錄學研究」（計畫編號：NSC 100-2410-H-002-111-MY2）之部分研究成果，承蒙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提供寶貴意見，得以完善，謹此致謝。

1 參見〈屈翼鵬先生行述〉，《屈萬里先生文存》第 6 冊，《屈萬里先生全集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1985 年）第十七種，頁 2143。

2 劉兆祐：〈不平凡的書傭〉引，《屈萬里先生文存》第 6 冊，頁 2231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著，刊行《屈萬里先生全集》，凡 15 種 16 冊 。[3] 其中經學類有 7 種；古文字學類有 4 種；版本目錄學類有 4 種。尚有單篇論文、隨筆、訪談錄、古體詩、紀念文等若干篇，匯集爲《屈萬里先生文存》1 種。

在屈先生淵博的學術生命中，尤其以研究經學之成就最爲世人稱道，被譽爲「臺灣經學研究的領航者」或「臺灣經學第一」。[4] 屈先生曾自述讀書治學之志向，喜經學、文字之學而不喜哲學思想，其原因及經過如下：

> 東魯學校校長夏老師溥齋（繼泉）先生[5]是一位著名的理學家，他打算由中學辦到大學，所以這所學校不叫做東魯中學而叫做東魯學校（後來纔改爲東魯中學）。初中的課程和其他初中相同，高中則專辦文科班。……除了各種正式的課程之外，每星期規定有兩小時的集體閱書。規定了兩種讀物：其一，是《韓詩外傳》，由孔老師指導。另一是《明儒學案》，由校長夏老師指導。夏老師和包龍圖一樣，笑比黃河清。他威嚴地坐在講臺上，同學們都屏氣息聲地埋頭苦讀《明儒學案》，有疑時也不敢發問。性呀命呀理呀氣呀，那些抽象而不可捉摸的名詞，在腦海裡翻上滾下，同學們都深以爲苦。我久是冥頑不靈的人，對於這些學理，更感到格格不入。後來對於宋明理學不感興趣，當時的痛苦經驗，當是

3 據屈費海瑾女士〈寫在屈萬里全集出版前〉一文，當時參與「屈萬里先生遺著整理小組」的有龍宇純、丁邦新、張以仁、陳瑞庚、黃沛榮、李偉泰、周鳳五、劉兆祐等先生。至於整理編輯《屈萬里先生文存》者，則以劉兆祐、林慶彰二位先生爲主。見《讀易三種》書前，《屈萬里先生全集》第一種。

4 李濟先生（1896-1979）語，參見何淑蘋：〈臺灣經學的領航者——屈萬里先生〉，《山東圖書館學刊》2009 年第 3 期（總 113 期），頁 110；〈近三十年屈萬里研究論著目錄〉，《書目季刊》第 43 卷第 2 期（2009 年），頁 99。

5 夏繼泉（1884-1965），字溥齋，號渠園，旅日時曾改名夏泉，字一翁，祖籍山東鄆城。清末舉進士，民國肇建，歷任山東省政府顧問、秘書長；國會議員、總統府秘書、山東鹽運使等職。1922 年辭卸公職，致力於文化教育事業，創辦東魯中學，自任校長，並沉潛於佛學，1932 年起，專弘淨土宗，並改名夏蓮居，以旌其志。與梅光羲（1880-1947）並稱「南梅北夏」，爲民國佛教一位重要居士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原因之一。[6]

其後屈先生終身研究經學與古代史、文獻學，都是屬於考據學的範疇，即與其性格有關。至於研治經學的資料與方法，以《周易》爲例，先生指出：

> 我們研究《周易》，首先要了解經文。經文有經有傳，傳的意見，不一定盡合經文，所以要以經觀經，以傳觀傳。然後從訓詁、文字、音韻等方面入手，參以金文、甲骨文，及其他考古學、以及先秦文獻等資料，客觀的尋求經文的本義。本義既明，才能利用《周易》經傳的資料，分別做各方面的研究。[7]

由於屈先生非常重視學術資料的完整與豐富，所以先生在研究經學問題時就廣泛運用了「傳世文獻」——各種經、史典籍；與「出土文獻」——甲骨文、金文、石經等。可知屈先生之經學研究之所以會有過人的傑出成就，實與其深厚的文獻學基礎分不開。屈先生曾云：

> 治學的目的，在求得眞實的知識；研究工作的目的，在獲得正確的結論。如果所根據的資料不正確，所得的知識，自然不夠眞實；以之從事研究工作，所得的結論自然也不會正確。因此，鑑別學術資料，是每一個從事學術工作的人，所必不可疏忽的。
>
> 鑑別資料應該注意的，約有以下的幾點：（一）、資料是眞的還是假的？（二）、資料產生的時間問題，即它是當時的記載，還是出於後人的傳述？（三）、資料是完整的，還是殘缺的？（四）、資料經過歷代的傳寫和傳刻，文字難免訛誤，究竟哪一個本子的訛誤較少？[8]

屈先生所強調的資料鑑別工作，其實也正是文獻學的任務之一。當代文獻學家、歷史學家張舜徽先生（1911-1992）也曾指出：

> 清末張之洞在《輶軒語》中說過：「一分眞僞，而古書去其半。」的

6 〈中學生活片段的回憶〉，收入《屈萬里先生文存》第 5 冊，頁 1783-1784。

7 〈推衍與附會——先秦兩漢說易的風尚舉例〉，收入《屈萬里先生文存》第 1 冊，頁 104。

8 引文見《先秦文史資料考辨》，收入《屈萬里先生全集》第四種，頁 5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> 確，我們面對著浩如煙海的古代文獻，不免望洋興嘆。如果能掌握住辨僞的本領，便自能辨別古書的價值，有所別擇去取，不致空耗歲月，多走彎路，這對節省時間來說，也有極大好處。所以辨識僞書，是研究、整理古文獻的人必須學會的本領。即使自己一時難於進行這一工作，但對前人已經論定、爲學術界所公認了的問題，有必要把它弄清楚，在作考證文字時，也可不致誤引僞書，把假東西當成眞材料了。[9]

張先生所言，和屈先生的見解可說是異曲同工，揭示了文獻考證及辨僞在學術研究過程中的重要性。

由於屈萬里先生主要學術成就在經學，其基礎則建立在紮實的文獻掌握，不妨稱之爲「經學文獻學」。[10] 屈先生在此學科的貢獻，非常豐碩，本文將先從版本目錄、石經考辨與民俗解經等三方面，對屈萬里先生的經學文獻學做一個初步的探索。至於屈先生在甲骨文、金文研究方面的成就，更爲世人所矚目，限於篇幅，將另撰專文加以探討。

二、版本目錄與經學研究

與經學研究相關的文獻學知識，首先是版本學。早在民國四十年（1951）屈先生即已撰有〈十三經註疏板刻述略〉一文，考查《十三經註疏》的形成經過及重要流傳版本，顯示其研究經學應從版本學入手的觀點。[11] 其後又撰〈讀古書爲什麼要講究版本〉一文，[12] 進一步說明版本學在治學方面的重要。在該文中，屈先生首先指出：

---

9 參見張舜徽：《中國文獻學》（鄭州：中州書畫社，1982 年），頁 192。

10 據筆者所知，目前「經學文獻學」一詞，已經在經學界、文獻學界逐漸成立。如林慶彰先生在臺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開設「經學文獻學」課程，內容除經學史外，亦涉及版本、目錄、校勘等方面的知識。

11 〈十三經註疏板刻述略〉，收入《書傭論學集》，《屈萬里先生全集》第十四種，頁 216-236。

12 〈讀古書爲什麼要講究版本〉，收入《屈萬里先生文存》第 3 冊，頁 987-994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因爲古書流傳到現在，不知道已經過多少次的傳抄和若干次的刻板，每一次傳抄和每一次刻板，都難免有錯誤的地方。所以越古的本子，錯誤應該越少，這是很容易明瞭的道理。

接著屈先生分別歸納出三條讀古書不能不講究版本的原因：

一、欲辨圖書眞僞，不能不講究版本。

屈先生舉出兩個例子，說明版本知識對辨別僞書的重要，一是宋人眞德秀（1178-1235）引《僞古文尚書・大禹謨》篇的「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。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」，稱爲「堯舜禹所傳心法，萬世聖學之淵源」，其於哲學方面固然可說有所創發，但因文獻根據是僞古文《尚書》，自然不能上溯到堯、舜或孔、孟了。二是通行本《竹書紀年》並非晉太康間所得之眞本，而是明人所僞造的，要採用《竹書紀年》的資料，應參考王國維《古本竹書紀年輯校》與錢穆先生的《先秦諸子繫年考辨》。

二、欲知圖書有無殘闕，不能不講究版本。

屈先生舉出若干例子，說明研究學問，一定要根據內容完整的書籍，而且要知道如何辨明有無缺佚，找到完全的本子。如歷朝正史，清・武英殿本廿四史即有許多闕葉，民國初年商務印書館影印《百衲本二十四史》就要完整得多。唐人權德輿（759-818）的《權載之文集》，《四庫全書》所收的本子是十卷，而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引王士禎（漁洋，1634-1711）《居易錄》載有五十卷本，今國家圖書館藏有此書之殘本，存卷四十三至五十，證明原本確有五十卷，清・朱珪（1731-1807）曾據傳抄本刻印五十卷之足本。又如宋・江少虞《皇朝類苑》，[13] 據其自序，全書應有「七十八卷二十八門」，而《四庫全書》所收的本子是六十三卷二十四門，以

[13] 案：此書全名《皇朝事實類苑》，亦名《事實類苑》，南宋・江少虞編。少虞，字虞仲，常山人，政和進士，歷任建、饒、吉三州太守。此書成於紹興十五年（1145），僅紹興二十三年（1153）麻沙書坊曾經刻印，歷元、明、清三朝均無刻本。日本元和七年（1621）木活字本，上海圖書館亦藏有一部。參見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 年）卷 123，子部・雜家類第 3 冊，頁 3-663；《宋朝事實類苑》點校本（臺北：源流出版社，1982 年），頁 1-5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致《四庫全書總目》認爲江氏自序有誤。今國家圖書館藏有此書之日本元和七年（1621）所刻活字本，其底本出自宋刊麻沙本，正是七十八卷二十八門，較四庫本多了「詼諧戲謔」、「神異幽怪」、「詐妄謬誤」、「安邊禦寇」四門。

三、欲免受錯字的欺騙，不能不講究版本。

前述屈先生已指出古書每經一次傳刻，就難免多一些錯誤，更何況還有校勘不精、任意刪改的情形。例如《水經注》，清初僅存明代嘉靖以後所刻諸本，經常有錯漏之處。經戴震（1723-1777）以《永樂大典》本對校，共補了明刊本的缺漏 2128 字，增刪 1448 字，糾正臆改的 3715 字，《水經注》一書始有較可靠的本子。[14] 又如明末毛氏（毛晉，1599-1659）汲古閣所刻書，門類及數量都極多，幾乎遍及天下，然而刻印時多不根據宋、元古本上木，又踈於校勘，其實並非善本。

最後，屈先生推薦讀者可以根據清・張之洞（1837-1909）《書目答問》及《書目答問補正》[15] 二書，做爲研究學問時，尋找古書好的版本的入門書。此外，

[14] 案：汪辟疆〈明清兩代整理《水經注》之總成績〉一文，對戴震之《水經注》校本，有簡略評述，其文略云：「酈氏《水經注》四十卷，自唐李吉甫刪後，蜀板遷就，頗失其眞。而酈氏原書，在宋初又亡其五卷，元明之間，若隱若顯。……明人以重其詞采之故，終難久閟，刊校者屢矣。……今所傳明三刻本，惟朱謀㙔所箋，疑人所難疑，發人所未發，用力甚劬，故神明煥發。……清人從事校理酈注，其最爲世所誦習者：全祖望之七校《水經注》、趙一清之《水經注釋》、戴震之官校《水經注》。……戴震預修四庫館書時，曾取永樂大典中水經注舊文，鉤稽近本，據以增補訂正，多至 7291 字。其訂正各條，明注本文之下，並非盡出《大典》。且其時趙一清氏之《水經注釋》，謄稿進呈，戴氏固亦親見之。是戴氏校定酈注，或旁考群書，或參驗舊本，或獨伸己見，或旁採東潛，皆屬尋常之事。」參見《水經注疏》（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89 年），第三冊附錄，頁 3456-3457。戴校《水經注》有臺北世界書局 1974 年景印本行世。

[15] 案：《書目答問》五卷，附〈別錄目〉、〈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總目〉，題張之洞撰，實際是由繆荃孫（1844-1919）執筆，參見柳詒徵：〈書目答問補正序〉。《書目答問補正》，民國范希曾（1899-1930）撰。希曾字耒研，江蘇省淮陰縣人，畢業於南京高等師範學校，服務於南京國學圖書館期間，撰成《書目答問補正》。

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

屈先生在〈漫談本國文史研究——關於本國文史研究工作的一些問題〉、[16]〈古書的若干問題——文史研究叢談之一〉、[17]〈一個錯字的關係〉[18]等文章中也提出過同樣的見解，說明重視版本考辨是屈先生治學過程裡極爲重要的一環。

在版本學方面，屈先生還有一項創舉，就是編撰《圖書版本學要略》一書，使版本學走向學術化、規範化。中國古代原來並無版本學的名稱，清末葉德輝（1864-1927）撰《書林清話》，雖然初步建立起版本學的體系，但也尚未使用版本學做爲書名。民國四十二年（1953），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印行《圖書版本學要略》，書前屈先生自序云：

> 自葉郎園《書林清話》問世，言吾國圖書版本者，始有專書。葉氏書網羅宏富，用力甚勤，然係長編性質，而非簡明之論著，故讀之者或不免感其繁蕪。爾後孫毓修氏有《中國雕板源流考》之作，然以專述雕板源流，命題既隘，取材復略，故又失之太簡。近年坊間雖亦偶有言板本之書，然率皆因襲葉書爲之，作者又非能鑒別板本之人，故殊未足饜學林之求也。
>
> 萬里服役圖書館界，先後歷十餘年，因司中文舊籍考訂編目之事，欲覓一簡明適用之板本學書，而迄不能得。乃發憤搜集材料，擬編輯爲書，以就正於國人。此意動於抗戰之前，在山東圖書館執役時也。八年期間，雖未悉克在圖書館界服務，而搜集材料之事，則未嘗或輟。至勝利還都，以任職中央圖書館之便，所見異本益多，所得材料漸富，於是董而理之，開始屬稿。迨三十七年秋，稿成甫半，而中原板蕩，京華騷動，又復流寓臺灣。由於職業之更易，遂無暇及此，舊稿擱置篋中，蓋四年於茲矣。[19]

---

16 〈漫談本國文史研究——關於本國文史研究工作的一些問題〉，《屈萬里先生文存》第 3 冊，頁 895-901。

17 〈古書的若干問題——文史研究叢談之一〉，同前註，頁 911-919。

18 〈一個錯字的關係〉，同前註，頁 929-936。

19 〈圖書版本學要略自序〉，《屈萬里先生文存》第 4 冊，頁 1333-1334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由序文可知，屈先生因當時學術界並無一適合教學、研究用的版本學專書，因而立志開闢榛蕪，自撰新著。此書問世後，確也在臺灣學術界引起高度重視，早期幾乎所有講授版本學的教師都是以屈先生此書做爲教材，到目前爲止，此書仍然是國內學者自撰的、唯一的一本版本學專書。[20]

本書內容凡分四卷：卷一「前篇」，敘述中國歷代書籍名稱、形制，及璽印石刻之傳拓與書刻之關係等。卷二「源流篇」，敘述雕板印刷的發明、歷代雕板印書的情況，以及套印本、活字本的發展等。卷三「鑒別篇」，敘述如何鑑別古籍的年代與眞僞，分別從版式、字體、行款、刻工、紙張墨色、避諱字等方面，說明鑑別方法，並舉出辨別版本先後的實例，以及書估作僞手法的介紹等。本篇可說是此書最重要，也是最具特色的一篇，因爲屈先生與昌彼得先生（1921-2011）都曾負責典藏善本圖書，鑑別經驗豐富，所言都是出於目驗，不同於純理論的闡述，對於一般學者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。卷四「餘篇」，列舉考訂善本應用之參考書目、善本書目版本項著錄之原則、版本學常用之術語及年表（附避諱字），並附錄善本書影。當代已有學者稱譽此書爲「我國版本學領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」，[21] 充分反映了屈先生在版本學發展中的貢獻。

其次，目錄學對於經學研究也有重要的功用。清・王鳴盛（1722-1797）云：

> 目錄之學，學中第一要緊事，必從此問途，方能得其門而入。……凡讀書，最切要者目錄之學。目錄明，方可讀書；不明，終是亂讀。

江藩（1761-1831）亦云：

> 目錄者，本以定其書之優劣，開後學之先路，使人人知某書當讀，某書

[20] 案：此書係屈先生撰寫原稿，後經昌彼得先生修訂續成，是以版權題名作者爲屈先生與昌先生並列，但屈先生仍有訂定架構、導夫先路之功，合應敘明。又民國七十四年（1985），此書由潘美月先生（1939-）協助昌先生進行增訂工作，由中國文化大學出版社出版增訂本。

[21] 徐憶農：〈屈萬里先生版本目錄學成就〉，《山東圖書館學刊》2009 年第 3 期（總 113 期），頁 128-130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不當讀，則易學而成功且速矣。吾故嘗語人曰：「目錄之學，讀書入門之學也。」[22]

屈先生對於目錄學的重視，也時時表現於其文章之中，如〈從目錄學的立場看中國古書的一些問題〉[23]一文，屈先生以目錄學爲基礎，指出古書中應考辨的問題：（一）圖書的眞僞問題，（二）圖書的著成時代問題，（三）圖書版本的優劣問題。又如〈子部雜家類之新的分類問題〉[24]一文，是檢討傳統四部分類法中的子部雜家類各書，在現代圖書館常用之十進分類法下，應如何歸類的問題。屈先生指出四部中以子部的分類最爲困難，其中又以雜家最爲複雜。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將雜家分成六個子目：1、雜學之屬，2、雜考之屬，3、雜說之屬，4、雜品之屬，5、雜纂之屬，6、雜編之屬。其中「雜學之屬都是談哲理的書，不能不改入哲學類；雜編之屬都是叢書，不能不改入叢書類」，至於其他四個子目的書籍，則應該採用何日章「中國圖書十進分類法」的辦法，分別放在「總類」（綜合類）之下的「普通論叢；國學」內，列表如下：

普通論叢；國學

070 普通論叢

071 雜考

072 雜說

073 雜品

074 雜纂

（中略）

077 講演集

078 現代普通論文集

079 國學

[22] 參考羅孟幀：《中國古代目錄學簡編》（臺北：木鐸出版社，1986 年），頁 9-10。

[23] 〈從目錄學的立場看中國古書的一些問題〉，《屈萬里先生文存》第 3 冊，頁 937-947。

[24] 〈子部雜家類之新的分類問題〉，同前註，頁 967-972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屈先生還認爲這一類的總名應該用「雜著」代替「普通論叢；國學」。

在目錄學的具體實踐方面，屈萬里先生於民國三十年（1941）所創制的《國立中央圖書館中文圖書編目規則》，對中國的圖書館界、目錄學界都有很大的影響。其中《善本圖書編目規則》更是各大圖書館編制善本書目時共同依循的準則。[25] 還有「善本書志」24 篇，[26] 是屈先生自民國三十一年（1942）起，擔任國立中央圖書館編纂時，陸續撰寫的。

另外，屈萬里先生在目錄版本學方面最重要、最知名的研究成果，就是撰寫了《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》之專書。

民國五十四年（1965），屈先生應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（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）之聘，擔任訪問學人，並整理普大葛思德東方圖書館（East Asian Library and the Gest Collection, Princeton University）的善本書，撰寫提要。〈《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》跋〉[27] 云：

> 普林斯頓大學所藏中文善本圖書，於北美洲各圖書館爲巨擘。當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，北平圖書館王重民先生[28] 在美，曾爲之作《志》，積稿四冊。其後胡適之先生來服務於斯館，核王氏稿，發現問題頗多。又後，牟復禮教授[29] 覆閱是稿，亦感有重訂之必要。萬里乃以復禮教授

[25] 劉兆祐：〈屈翼鵬先生對中國圖書館事業的貢獻〉，《屈萬里先生文存》第 3 冊，頁 2194-2195。

[26] 此 24 篇善本書志均已收入《屈萬里先生文存》第 4 冊，頁 1517-1596。

[27] 〈《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》跋〉，《屈萬里先生文存》第 4 冊，頁 1335-1336。

[28] 王重民（1903-1975），字有三，號冷廬，河北省高陽人。畢業於北京高等師範學院，曾服務於北京圖書館，專研版本目錄學、敦煌學及圖書館學等。又遠赴法國、美國等地調查善本書，撰寫提要，1952 年創立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，並擔任教授。主要著作有：《中國目錄學史》、《中國目錄學史料》、《老子考》、《清代文集篇目分類索引》、《日本訪書志補》、《太平天國官書》、《敦煌古籍敘錄》、《中國善本書提要》、《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國善本書錄》等。

[29] 牟復禮（Frederick W. Mote，1922-2005），美國著名漢學家、中國史學家，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、東亞系教授。主要代表作有：《帝制中國 Imperial China: 900-1800》、《劍橋中國史・明清卷》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之推薦，承高深研究所及普林斯頓大學互約，來美從事斯業。自客歲（1965）九月起，取王氏舊稿，與原書一一勘對，誤者正之，遺者補之，至今春元月而畢事。

是書稿本完成後，由於種種原因未能及時出版，直到民國六十四年（1975），因普大贊助印刷費用，纔由臺北藝文印書館出版，今已收入《屈萬里先生全集》第十三種。其中著錄之古籍約 1138 種，51212 卷（據書前目錄計算所得）。民國五十八年（1969），屈先生特撰〈普林斯頓大學所藏中文善本書質疑〉[30] 一文，以自己撰寫善本書志的經驗，指出普大藏書其中一部份有問題的古籍，深具學術意義。屈先生將這些古籍分爲四大類：

（一）攘竊他人的作品，冒充己作的書。

例如：《福壽全書》六卷，原題「雲間陳眉公輯・鹿城顧錫疇定」，明崇禎間刻本。該館又藏有明・鄭瑄《昨非庵日纂》二十卷，也是崇禎間刻本，將這兩部書比勘之後，發現二書內容完全相同，版式也幾乎一樣，原來《福壽全書》就是將《昨非庵日纂》的書板剜改而成。與此書同樣情況的還有《新鍥簪纓必用增補秘笈新書》十六卷、《彙書詳註》三十六卷、《唐詩紀》一百七十卷等書。

（二）襲取他人的刻本，冒充己刻的書。

這種情形與前一種不同的是：有的只是襲用他家的書板，只將校刻者的姓名剜改一下，至於書名與著者，並未改動。有的連書名也改了，但著作者仍然保留。這是由於坊刻之書，常有互相買賣之舉，新的主人爲了表示版權所有及以新書號召，才有所更動。例如：崇禎刊本《性理標題彙要》（製錦堂梓行）與《性理標題綜要》（梅墅石渠閣藏板）二書，二十二卷完全一樣，而《彙要》是改自《綜要》。相同情況的還有《明辨類函》、《二十子》等書。

（三）以明刻本冒充古本。

[30] 〈普林斯頓大學所藏中文善本書質疑〉，《屈萬里先生文存》第 3 冊，頁 1139-1156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這是古代——尤其明代的書估常用的技倆，例如：明・凌稚隆《史記評林》一百三十卷，普大藏有三部，其中有一部經過書估僞作，把紙張染成陳舊的暗黃色，把原書王元美、茅鹿門、徐中行三家序文都撕去，又把明人的評語都改成宋代或宋以前人。然後評語中引到楊慎的《丹鉛錄》，卻忘記改掉，留下線索；而且字體一望即知是明代刻書字體，難逃屈先生之法眼。其他還有《羣書考索》、《集千家註批點補遺杜工部詩》均是。

（四）以殘本冒充全本。

這也是書估爲了提高書籍的價值而作僞的手段，例如明・徐中行《清蘿館詩》，原應是前集四卷、正集六卷，合爲十卷。普大所藏前集四卷、正集存前三卷，合計只有七卷。書估乃將書前俞允文〈序〉中「勒成十卷」的十字挖掉，再將「秋七月」的七字剜下，補到十字的位置；七字的空缺，用紙補起來，用墨筆填上一個八字。於是「勒成十卷」變成「勒成七卷」，「秋七月」變成「秋八月」，再將正集卷四以下的目錄全部去掉。如此一來，目錄所存的卷數，就完全與序文相合了。類似的還有《唐詩拾遺》、《蘇隽》等。

還有三部可據以辨別其他僞書的書，如《籌海圖編》十三卷，明末以來都以爲是胡宗憲（1512-1565）作的，普大藏有嘉靖四十一年（1562）原刻本，作者題爲鄭若曾（1503-1570）。原來天啓四年（1624）胡宗憲後人重刊此書時，故意將作者改爲胡宗憲，並將嘉靖間人所作的序跋通通去掉，以致鄭若曾的功勞幾乎湮沒不傳。又如《事物考》八卷，作者應爲嘉靖間人王三聘，《四庫全書》著錄本作「傅巖」；《新選古今類腴》十八卷，編者應爲陳世寶，《四庫全書》著錄本作「王世懋」。

最後，屈先生指出這些作僞的書幾乎都出於明代中葉以後，證明清人「明代刊書者，往往竄亂舊本，而沒所由來，此風嘉靖中已有之矣」，所言不虛。而僞作善本也可以用做教導鑑定版本時的教材。

屈先生的這部善本書志，是藏有中文善本圖書的海外知名大學的第一部書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志，此後陸續有歐美的圖書館或大學聘請專家編輯、出版善本書志，可說都是受到屈先生此書的啓發。[31]

早在民國年三十一年（1942），與屈先生誼兼師友的王獻唐先生（1896-1960）[32] 已經稱許屈先生在版本目錄方面的功力：

> 吾東自孝陸先生[33]歸道山，能眞知版本者，已罕其人。能鑒別者，未必能考據；能考據者，未必能鑒別，弟今兼之矣！[34]

由以上之析論，可證獻唐先生所言實非過譽之辭。

三、石經考辨與經學研究

在屈先生的治學過程中，除了版本學、目錄學的知識之外，無論經學、史學、圖書文獻學等，對於考古資料的重視與純熟運用，也是屢見不鮮的，這當

---

31 例如：沈津撰：《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》（上海：上海辭書出版社，1999 年）；李國慶撰：《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圖書館中文古籍書錄》（桂林：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3 年）；陳先行撰：《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5 年）；喬曉勤撰：《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》（桂林：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9 年）等。

32 王獻唐，字獻堂，初名家駒，後改名獻唐，號鳳笙，又號向湖老人，山東省日照市人。青島特別高等專門學校土木工程系畢業，通曉德文。曾任記者、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。1929 年，出任山東省圖書館館長。著意搜集文物典籍，擴充館藏，使山東省圖書館成爲當時全國收藏文物典籍最豐富的圖書館之一。其父王廷霖頗好金石之學，獻唐先生一生亦致力於此。著有《山東古國考》、《炎黃氏族文化考》、《雙行精舍題跋》等。

33 趙錄績（1875-1939），字孝陸，山東省安邱人。近代藏書家，精於古文字、古錢幣之學，又長於古詩詞、書畫鑑別等，與王獻唐爲忘年之交，著有《丁丑秋詞》、《謨鬯閣詞集》等。參見《雙行精舍書跋輯存續編》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86 年），頁 109。

34 劉兆祐：《屈萬里先生年譜》（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2011 年），頁 32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與屈先生非常重視辨僞之學有關。[35] 所謂考古資料即是考古學家由地下發掘而得的文獻或文物資料，現代學界稱之爲「出土文獻」（屈先生稱之爲「文物資料」），與其相對的是「傳世文獻」（屈先生稱之爲「圖書資料」）。漢、魏所刻的石經，亦屬於文物資料。

所謂「石經」，即是將經典的文字刻在石碑上，供讀者閱讀。也是中國古代印刷術發明以前，書籍存在的形式之一，其中又以儒家經典最早刊刻成石經，歷來研究者也較多。刊刻石經，始於東漢時期，靈帝熹平四年（175），詔諸儒正定五經，刊於石碑，稱爲《熹平石經》，所採用字體爲隸書，又稱爲「一字石經」，所刻經書爲：《周易》、《尚書》、《魯詩》、《儀禮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公羊傳》、《論語》等七種。至曹魏正始年間（240-247），又有刊刻三字（體）石經之事，三字爲古文、篆書、隸書，內容爲《尚書》、《春秋左氏傳》（至莊公中葉止）二經。

漢代熹平石經刻成後，未幾即毀於東漢末年的董卓之亂（190），經過魏晉南北朝的不斷破壞，到了唐代幾已完全毀滅。然而從宋代以後陸續有漢代石經的殘存石碑出土，引起學者的注意而加以研究，浸浸然形成了「石經學」。[36]

屈先生於民國三十一年（1942），因王獻唐先生之推薦，以「借調」方式進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擔任助理員，開始接觸甲骨文。在此之前，屈先生於山東省圖書館服務時，也是受到王獻唐先生的影響，[37] 已大量閱讀金文方面的書籍，屈先生與考古資料終身爲伍，也是自此開始。[38]

---

35 參見林慶彰：〈屈萬里先生與圖書辨僞〉，收入《屈萬里先生百歲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（臺北：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、國家圖書館編印，2006 年），頁 93-107。

36 見王獻唐〈漢魏石經殘字敘〉：「石經之在今日，已蔚爲專學。」屈萬里《漢魏石經殘字》書前，《屈萬里先生全集》第十五種。

37 屈先生曾自述云：「進入山東圖書館後，……由於館長王獻唐先生是金石學的名家，我當時受到他的影響，也讀了不少的金文書籍。」〈《書傭論學集》自序〉，《屈萬里先生文存》第 4 冊，頁 1330。

38 劉兆祐：《屈萬里先生年譜》，頁 35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除了甲骨文、金文之外，屈先生對石經也有深入研究，尤其是漢代熹平石經的輯佚與考辨，更爲學界所稱道。

屈先生曾於民國五十一年（1962）撰《漢石經周易殘字集證》、《漢石經尚書殘字集證》二書，[39] 對《周易》、《尚書》二經傳世的漢石經殘石加以彙整、復原及文字考釋。

《漢石經周易殘字集證》三卷，卷一「論證」（漢石經之刊刻及經數碑數；漢石經之毀廢與隋唐時代所傳之舊搨本；唐宋時代漢石經之發現與著錄；漢石經《周易》殘字之發現與著錄；漢石經《周易》之篇第；漢石經《周易》爲梁丘氏本），卷二「校文」，卷三「漢石經碑周易部分復原圖」。書前〈漢石經周易殘字集證自序〉云：

> 漢石經所刊七經，除《論語》爲諸家所通習，漢時不專置博士外；其餘諸經，皆立於學官之本。惜石經歷經摧毀，至唐初已十不存一；武后而後，竟毀廢淨盡。宋代雖有漢石經殘石之發現，然未見《周易》隻字。民國十一年後，漢石經《周易》殘石，始陸續出土。迄抗戰軍興之前，眾家所著錄者，已達千字以上。一千七百餘年前之故物，沈霾亦復千有餘年，一旦復出人間，宜學林詫爲奇緣而珍爲瓌寶也。
>
> 欲知今本《周易》與漢石經本篇第章次之異同及有無衍文、奪文，必先從事漢石經碑圖之復原。而此乃最爲繁劇之工作。幸有張氏《漢石經碑圖》一書，俾爲藍本，乃省却不少日力。然校核修正，亦頗費經營。

屈先生並指出整理《周易》漢石經，對於易學研究有四項貢獻：

一、確定漢人所稱《易經》十二篇之內容爲：《經》上、下；〈彖〉上、下；〈象〉上、下；〈繫辭〉上、下；〈文言〉；〈說卦〉；〈序卦〉；〈雜卦〉，與宋人呂祖謙所定本正同。

二、確定漢石經《易經》之底本爲「梁丘氏易」。

---

39 《漢石經周易殘字集證》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961 年排印本，收入《屈萬里先生全集》第十一種；《漢石經尚書殘字集證》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四十九（1963 年），收入《屈萬里先生全集》第十種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三、漢石經《易經》之篇第章次均與王弼注本不同，可據以訂正傳世本之誤。
四、漢石經《易經》每碑之行數、字數皆有一定，據此可推知其他各經應亦相同，且可用以校勘唐石經（開成石經）之誤。

《漢石經尚書殘字集證》三卷，卷一「論證」（漢石經《尚書》之發現與著錄；漢石經《尚書》所佔碑數；舊雨樓本漢石經《尚書》殘字之僞；漢石經《尚書》篇數及篇第；〈泰誓〉問題；漢石經《尚書》爲小夏侯本），卷二「校文」，卷三「漢石經碑《尚書》部分復原圖」。書前〈漢石經尚書殘字集證自序〉云：

> 《尚書》在群經中，最爲繁劇難理。但就其傳本言之：自漢以來，則有伏生所傳二十九篇本；有歐陽、大小夏侯增入〈泰誓〉且併〈康王之誥〉於〈顧命〉本；有孔壁古文本；有張霸百兩篇本；有東晉僞古文本。……然伏生本既經歐陽、大小夏侯所增併，而此三家之本又皆亡於西晉。後人但憑傳述之文獻，以推斷漢代今文家傳本之原面目。倘無漢代直接材料爲之佐證，究未能必其悉符漢世傳本之眞象。
>
> 蓋以殘石證之，知漢石經《尚書》確爲二十九篇，〈康王之誥〉確合於〈顧命〉，確有後出之〈泰誓〉，〈泰誓〉及〈盤庚〉皆確爲一篇；僞古文本之〈舜典〉確自〈堯典〉析出，而又妄增二十八字；僞古文本〈益稷〉確自〈皐陶謨〉析出。凡此皆清人所曾考定，而可以漢石經殘字證實者也。
>
> 孳治石經者，必當以復原工作爲先務也。惟《尚書》復原工作，煞費日力。《隸釋》所著《尚書》殘字，雖達五百五十以上，然以不著原石行款，又未注明孰在碑陽，孰居碑陰。近出殘字，多零碎小石，其中必有一石兩面有字者，而著錄家亦未明言。以是而定其在原碑之位置，殊費周章。往往沈吟竟日，而不能安一拳石；亦或布置既定，又牽一髮而動全身。稿經數易，終改張氏碑圖《尚書》部分之五碑十面爲四碑八面，然已否與原碑相符，亦未敢遽定。
>
> 他如漢石經《尚書》所據者究爲何家之本？宋代及清中葉以前之治漢石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> 經者，都未言及。皮錫瑞氏首謂其爲夏侯氏本，而語焉未詳。陳夢家氏曾申皮氏之說，而論多未諦。吳維孝據漢石經敘殘石「《尚書》小夏侯」等字，定爲夏侯建本，又因片辭孤證，未爲學林所注意。今參考三家之說，而以《尚書》殘字及〈石經敘〉殘字證之，知漢石經《尚書》所據者，確爲小夏侯本。

屈先生整理漢石經《尚書》殘字，證實清人對《尚書》的考證，許多結論是可信的，又據以復原石經的形制，給後人研究石經《尚書》提供可靠的依據。更進一步證明其底本爲夏侯建本，凡此都對《尚書》研究貢獻良多。

在實際進行石經文獻的研究方面，屈先生最著名的貢獻應是對所謂「舊雨樓藏漢石經」眞僞的考辨。[40]

民國三十四年，抗戰勝利，中央圖書館復員還京，屈先生正擔任中央圖書館特藏組主任，奉命接收僞汪精衛政府內政部長陳群（1890-1945）「澤存書庫」藏書。[41] 其中有一部題爲《舊雨樓藏漢石經拓本》的書，收錄漢代熹平石經殘字的拓片，裱褙冊葉線裝四冊，共計約一萬兩千字以上。屈先生曾先後請徐森玉（1881-1971）、[42] 蔣穀孫（1902-1973）[43] 兩位先生鑑定，皆謂其非

---

[40] 魯生〈中國上古史權威——屈萬里教授訪問記〉云：「想當年抗戰勝利後，屈教授從『詰』、『誥』一個誤字之差，而斷定舊雨樓所藏號稱一萬多字的拓本漢石經之僞，堪稱學術界的一大盛事！」《屈萬里先生文存》第 6 冊，頁 2082。

[41] 陳群，字人鶴，福建長汀人，早年就讀於福州私塾，辛亥革命後赴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，參加中華革命黨。1922 年，出任廣東大元帥府黨務處處長，1927 年，奉命前往上海，主持清黨事宜。其後，相繼出任上海法政學院總務長、首都警察廳廳長、內政部政務次長等職。抗戰爆發後，受日本人的引誘，於 1938 年出任僞內政部長兼教育部長。1942 年，陳群在南京頤和路 2 號建成一座三層樓的「澤存書庫」，以收藏他搜羅的 40 多萬冊新舊圖書。1943 年接任江蘇省省長。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，服毒自殺。參見蘇精：《近代藏書三十家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9 年），頁 175。

[42] 徐森玉，名鴻寶，字森玉，浙江省吳興縣人。近代著名之文物鑑定專家、文獻學家，清末就讀白鹿洞書院，曾中舉人，後入山西大學堂習化學。民國後歷任教育部僉事、故宮博物院古物館館長，抗戰期間參與搶救古籍善本之工作。1949 年以後，歷任上海博物館館長、中央文史研究院副院長。

[43] 蔣穀孫，名祖詒，浙江湖州南潯鎮人，近代大藏書家蔣汝藻（1877-1954）之子，以其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僞。民國五十一年，屈先生撰《漢石經周易殘字集證》，曾使用這批資料，但始終覺得其字體、行款太過一致，似出於一人之手，而覺得可疑。不久屈先生繼撰《漢石經尚書殘字集證》時，才因其中一個錯字而證明此《舊雨樓藏漢石經拓本》確是僞刻。後來屈先生再撰〈舊雨樓藏漢石經殘字辨僞〉一文，分別從四個方面詳細論證其僞：[44]

一、「字體不合」：宋・洪适《隸釋》卷十四已云：「今所存諸經字體不同，雖邕能分善隸，兼備眾體，但文字之多，恐非一人可辦。」再據民國以後發現確實是漢石經殘石的字體，各經多不相同，即使同爲《周易》一經之中，筆法也不一樣。而《舊雨樓藏漢石經拓本》字體完全出於一手，足知其僞。

二、「碑數不合」：王國維（1877-1927）據《洛陽記》推定漢石經共四十六碑，張國淦作〈漢石經碑圖〉即據王氏之說。然而屈先生復原《尚書》時，發現其每碑行數與張氏之圖所定不合，張氏每碑之行數相差甚大，顯然有誤。今《舊雨樓藏漢石經拓本》《尚書》部分之碑數與張氏全同，足證其乃依據張氏之說僞刻而不知其誤，並非眞品。

三、「部位不合」：屈先生根據自己復原的《尚書》殘石碑圖，發現《舊雨樓藏漢石經拓本》竟將應分屬兩塊石碑的文字刻在同一塊石碑上，甚至有石碑正面與背面行數相差達三分之二的現象，作僞之跡顯然。

四、「經文誤字」：如〈微子〉篇「小民方興，相爲敵讎」，其中「方」字舊雨樓本據段玉裁之說改爲「旁」，然此字皮錫瑞《今文尚書考證》卷九已訂正爲「竝」；又〈呂刑〉篇「度作刑以詰四方」，其中「詰」字舊雨樓本據孫星衍《尚書今古文註疏》卷二七改爲「誥」，然而孫氏之說乃是根據了錯誤的《困學紀聞》的本子，一誤再誤，使得舊雨樓本之僞跡證據確鑿。

家學深厚，亦長於文物鑒別、善本收藏。1949 年後，輾轉隨國民政府遷臺，曾任教於臺灣大學中文系所，開設書畫鑑定等課程。參見《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系史稿 1929-2002》（臺北：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，2002 年），頁 40。

44 〈舊雨樓藏漢石經殘字辨僞〉，《屈萬里先生文存》第 1 冊，頁 25-35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從屈先生研究石經的動機來看，並不是僅以校勘文字異同爲目的，也不是僅考察石經的形制、輯佚等問題，而是將研究成果運用於經學研究，可說不屬於前述石經研究之兩大派。如屈先生研究經學，以《周易》爲主，其早在民國三十五年（1946）撰《周易集釋初稿》時，即已採用漢石經之資料，考察《易經》十二篇之次序。[45] 又如屈先生撰〈漢石經周易爲梁丘氏本考——跋張溥泉先生藏漢熹平石經周易殘石〉一文，考證漢石經《周易》之底本應爲梁丘賀本，[46] 其文略云：

> 客歲（1944）張溥泉先生獲漢熹平石經《周易》殘石一，正反兩面，正面爲經文，存二十八字，反面爲校勘記，存二十四字。……此石正面爲經文〈蒙卦〉至〈比卦〉之殘字，熹平石經《周易》每行七十三字，以是推證，知此乃《周易》第一碑經文第五行至第九行之殘字也。
>
> 山東省立圖書館藏有〈比〉卦至〈履〉卦殘石，亦反正兩面，反面爲〈雜卦傳〉及校勘記殘字。……羅振玉氏因其有「易經梁」三字，曾謂熹平石經《周易》所據者爲梁丘氏本。惟羅氏無他佐證，學者未之信也。反之，自馬叔平（衡）先生謂熹平石經《周易》所據之祖本爲京氏本後，學者靡然風從，幾成定讞。……馬氏云：「熹平石經之例，以一家爲主，而著他家異同於後。」曾列舉《詩》、《公羊》、《論語》諸經之校記爲證，其說至當不易。且謂熹平石經《周易》如爲京氏本，則「其碑末校記中，當著施、孟、梁丘之異同，如《詩》、《公羊》、《論語》之例。」今此石反面之校記寥寥二十四字中，「孟、施、京氏」語凡三見，乃有京氏而無梁丘。後漢《周易》之立於學官者，既僅施、孟、梁丘、京四家，《校記》中既已出施、孟、京三家，則其主本必梁丘氏本，斷然無疑。復證以山東圖書館藏石，其校記開首爲「易經梁」三字，知其語當爲「《易經》梁丘氏本」之意，又必無疑也。熹平

[45] 參見《讀易三種》，頁 465。

[46] 〈漢石經周易爲梁丘氏本考——跋張溥泉先生藏漢熹平石經周易殘石〉，《書傭論學集》，頁 1-6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> 石經《周易》爲梁丘氏本之說既定，則由於誤以爲京氏本，又從而引申之，以證〈說卦傳〉及〈繫辭傳〉中「尚象制器」一章爲京房之徒所僞作等說，[47] 其是非亦可以不待煩言而解。

案：張繼（1882-1947），字溥泉，河北省滄縣人。早年追隨孫中山先生，宣傳革命思想。民國建立後，歷任黨、政要職。馬衡（1881-1955），字叔平，別號無咎、凡將齋主人，浙江省鄞縣人。曾任北京大學教授、故宮博物院院長等，爲近現代著名之金石、考古學家。在此文中，屈先生先從「用字之異同」，再從「石經校勘之義例」等兩方面，一一對馬衡之說提出辯駁，從而得出正確結論，展現了屈先生實事求是，不拘泥於權威之說的學術精神。

再者，與古籍辨僞的精神一致，屈先生對於出土資料與傳世資料，也是採「中道」的立場，主張二者應一視同仁，不可偏廢，此一精神也表現於其石經研究。屈先生云：

> 文物幾乎全部是原始資料，圖書大部分是傳述資料。在學術研究方面來說，原始資料自然遠勝於傳述資料，這是文物勝過圖書的地方。但文物資料很多是沒有文字的，有文字的，也多是簡略的記述某些特定的事項。而這些記載，則遠不如圖書資料之詳備。這是圖書勝過文物的地方。因此，文物和圖書，適足以相輔相成，而不可偏廢。[48]

自從王國維提出「兩重證據法」的研究方法論之後，[49]「出土文獻」的重要性已無庸多言。近半個世紀以來，地不愛寶，出土文獻大量問世，無論研究

---

47 案：屈先生此處所指的當是《古史辨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2 年重印本）第 3 冊上編所收的幾篇文章：顧頡剛：〈論易繫辭傳中觀象制器的故事〉；錢玄同：〈論觀象制器的故事出自京氏易書〉；胡適：〈論觀象制器的學說書〉。

48 〈文物資料和圖書資料的關係〉，《屈萬里先生文存》第 3 冊，頁 883。

49 此說見於王國維：《古史新證——王國維最後的講義》（北京：清華大學出版社，1996 年），〈第一章・總論〉，頁 2。原文略記如下：「吾輩生於今日，幸於紙上之材料外，更得地下之新材料；由此種材料，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，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爲實錄，即百家不雅馴之言，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。此『二重證據法』，惟在今日始得爲之。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，不能加以否定；而其已得證明者，不能不加以肯定，可斷言也。」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文學、思想、古代史，如果不能運用出土文獻，以證成其說，幾何不被譏爲「不懂學術行情」！然而，隨著學術觀念的進步，愈來愈多人體認到出土文獻固然有其重要性，但是也不能完全取代傳世文獻的地位，甚至僅僅根據出土文獻，而沒有其他資料來研究問題，其局限性仍然是很大的。目前已有學者提出「三重證據法」甚至「四重證據法」[50] 來補充王國維的說法，這說明僅據出土文獻以從事文史研究還是不夠的。現在重讀屈萬里先生當年的主張，不能不指出這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、值得後學者深思的中肯意見。

四、民俗傳說與經學研究

由於屈先生非常重視學術資料的完整與豐富，所以在研究經學問題時就廣泛運用了傳世文獻——各種經、史典籍；與出土文獻——甲骨文、金文等。甚至還運用了民俗資料以詮釋部分經義。先生自云：

> 經書，自漢代以來，認爲是金科玉律、至高無上的寶典。民俗，在古代士大夫心目中，認爲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物事。因而歷代說經的先儒，很少用俗事俗物解說經義的（原注：但並非沒有）。可是，實際上經書中涉及民俗的地方很多。而這些民俗，或爲先儒所無屑於採用；或爲學者所未嘗注意；也或者中原已無其俗，而國外或邊疆地區還保存著，因未爲國內學者所知，以致未能採及。可是用民俗來解說經義，往往使人有渙然冰釋之樂。[51]

民俗與經義——尤其與禮制的關係，本來就很密切。《禮記・曲禮上》：

---

[50] 「三重證據法」有不同界定，多是在王國維的基礎上，再加別的材料，如口述史料、民族學史料、田野調查資料等等，總之是取得更多的資料佐證之意。「四重證據法」亦無非是此意的延伸擴大而已。參見鍾珮煖：〈三重證據法的運用——《左傳》「少昊以鳥名官」爲鳥圖騰說之商榷〉，《花蓮教育大學學報》第 22 期（2006 年 5 月），頁 39-54。

[51] 〈民俗與經義〉，《屈萬里先生文存》第 5 冊，頁 1683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「禮從宜，使從俗。」又云：「入竟（同境）而問禁，入國而問俗，入門而問諱。」[52] 顧炎武《日知錄・天文》亦云：

> 三代以上，人人皆知天文：七月流火，農夫之辭也；三星在天，婦人之語也；月離于畢，戍卒之作也；龍尾伏辰，兒童之謠也。後世文人學士，有問之而茫然不知者矣。[53]

可見民俗本就植根於民間文化，經典所記，也不出民間生活，想要正確解讀經典原意，民俗正是不可忽視的參考資料。

推原以民俗解經，宋人已開此風。如：

> 荊公〈改正經義劄子〉云：「臣近具劄子，奏乞改正經義。尚有〈七月〉詩剝棗者，『剝其皮而進之，養老也』，亦合刪去，取進止。」毛《傳》解剝爲擊，荊公不謂然，乃以養老解之。偶一日，到野老家，問主人何在？曰：「撲棗去矣！」荊公悵然自失，歸而請刊去之。[54]

案：《詩・豳風・七月》六章：「六月食鬱及薁，七月亨葵及菽，八月剝棗，十月穫稻，爲此春酒，以介眉壽。」毛《傳》：「剝，擊也。」《說文》：「剝，裂也。从刀，彔。彔，刻也。彔亦聲。剝或从卜。」段《注》：「〈豳風〉假剝爲攴，『八月剝棗』，毛曰：剝，擊也。《音義》云：普卜反。故知剝同攴也。」王安石嘗撰《字說》，因其不懂古韻古義，解字時常喜用會意以說形聲，以致爲蘇軾等譏評。這個故事是說王安石解釋〈七月〉詩中的「剝棗」，不用毛《傳》的說法，而以通行的意義「剝開表皮」去解釋，聯繫下文的「養老」一事（《毛詩正義》引鄭《箋》的說法亦同）。然而有一次當王安石到鄉下去訪友的時候，才偶然得知民間俗語正是「撲棗」（撲音義同攴），證明毛《傳》是對的。[55] 王安石當下雖然「悵然自失」，但是勇於改過，上奏

[52] 《禮記・曲禮上》（臺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80 年影印十三經注疏本），頁 12。
[53] 《日知錄》（臺北：明倫出版社，1974 年），卷 30，頁 855。
[54] 丁傳靖輯：《宋人軼事彙編》（臺北：源流出版社，1982 年），卷 10，上冊，頁 493。
[55] 近人高亨注此句，亦云：「剝通扑，擊。」撲、扑、攴均同音。見《詩經今注》（臺北：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1984 年），頁 203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請求將錯誤的解釋刪去，表現出讀書人實事求是的精神，還是值得肯定的。

在屈先生之前，民國初年顧頡剛（1893-1980）研究「孟姜女故事」，就是運用民俗學的資料。[56] 清華大學教授聞一多（1899-1946）也已經大量採用民俗資料及人類學觀點以解讀《詩經》。[57] 如《詩・召南・摽有梅》：「摽有梅，其實七兮，求我庶士，迨其吉兮。」毛《傳》：「摽，落也。盛極則墮落者，梅也。」鄭《箋》：「梅實尚餘七未落，喻始衰也。謂女二十春盛而不嫁，至夏則衰。」聞氏辨之云：

> 意者，古俗於夏季果熟之時，會人民於林中，士女分曹而聚，各以果實投其所悅之士，中焉者或以佩玉相報，即約爲夫婦焉。《晉書・潘岳傳》：「岳美姿儀，……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，婦人遇之者，連手縈繞，投之以果，遂滿載以歸。」蓋猶有古俗之遺意歟？《傳》訓摽爲落，而以梅落喻女色浸衰，失之。[58]

又如《詩・召南・葛覃》：「言告師氏：言告言歸，薄汙我私，薄澣我衣。」毛《傳》：「言，我也；師，女師也。古者女師教以婦德、婦言、婦容、婦功。」鄭《箋》：「我告師氏者，我見教告於女師也。」聞氏辨之云：

> 案：如班（《白虎通・嫁娶篇》）鄭（《儀禮・士昏禮・注》）所云，其人既爲大夫之妾，士之妻，老而無子，又出而不復嫁，則師氏之名，雖若甚尊，其職則甚卑。……要之，女師之職，略同奴婢，特以其年事長而明於婦道，故尊之曰師耳。詩曰：「言告師氏：言告言歸，『薄汙我私！薄澣我衣！』」告者，告師氏爲己澣衣也。「薄」爲命令之詞。

---

[56] 顧頡剛著，王煦華編：《孟姜女故事研究集》（臺北：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1985年）。

[57] 聞一多，本名家驊，字友三，湖北省黃岡縣人。曾任中央大學、山東大學、清華大學等校教授，其所著《神話與詩》、《古典新義》等書，研究古代的神話、《詩經》、《楚辭》、《周易》、《莊子》，被郭沫若稱爲「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」。

[58] 《古典新義》乙集，收入《聞一多全集》（臺北：育民出版社，1981年）第3冊，頁88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師氏本封建貴族之一種家庭奴隸，故詩人之言如此。《傳》《箋》專就其教人之一事爲言，則一若其道甚嚴而位甚尊者，此不可不辨也。[59]

近人高亨《詩經今注》於此詩之「師氏」注曰：「貴族家中管教女奴的管家婆。」似亦採聞氏之說。[60] 論者評析聞一多的詩經學，也著重指出「注意民俗的時空變化，可增加論說的深度與廣度」爲其優點。[61]

屈先生很早就開始對民俗資料的注意及搜集。如先生於民國二十二年（1933），即曾注意搜集山東各地之方言，撰〈齊魯方言雜考〉，[62] 發表於民國二十五年《時代青年》創刊號。其中「俺」字，先生以爲「言、卬、姎」三字與「俺」並爲雙聲，用以解《詩・周南・葛覃》「言告師氏」之「言」字即我也。屈先生早年曾在孔子家鄉曲阜生活過，也曾訪查記載當地的古蹟文物。[63] 民國三十六年（1947）撰〈曲阜散記〉，發表於《天津民國日報・史與地周刊》；[64] 民國四十六年（1957）撰〈闕里聖蹟述證〉，發表於《孔學論集》第二冊；[65] 民國六十五年（1976）撰〈曲阜的聖蹟〉，發表於《山東文獻》二卷一期。[66] 到了臺灣之後，屈先生仍然注意民俗資料的搜集，曾計畫編輯各地風謠於一書，其遺稿中即有一冊題名爲《風謠集》者，所採各地記錄民歌之書近十種，其中有一些已極罕見，頗爲有功於文獻之保存。[67]

---

59 同前註，頁 111。

60 《詩經今注》，頁 4。

61 朱孟庭：〈經典的文化詮釋——論聞一多《詩經》的婚嫁民俗闡釋〉，收入《第四屆文學與資訊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（臺北：國立臺北大學中國語文學系，2008 年），頁 70。

62 《屈萬里先生文存》第 5 冊，頁 1725-1729。

63 〈曲阜散記・序〉：「民國二十六年（1937）十月，避倭寇之難，攜山東省立圖書館所藏善本圖書及金石器物，僦居於曲阜城內玉虹樓旁民舍。所居多暇，遂得暢遊城內外諸勝蹟。……爰就所見所聞，拉雜錄之。管窺所及，間作辨證。匪曰有補於志乘，亦聊以發思古之幽情而已。」同前註，頁 1737。

64 同前註，頁 1737-1747。。

65 同前註，頁 1755-1766。

66 同前註，頁 1749-1754。

67 《風謠集》，收入《屈萬里先生文存》第 6 冊，頁 1611-1659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屈先生以民俗解經的方法，其舉例雖然不多，也並未形成系統的呈現，[68]但是舉重若輕，言之有物，頗堪玩味。現將其中與「解釋經義」有關者，略加分類，具列如下。[69]

（一）與「事物」有關的習俗

1. 願言則嚏

《詩・邶風・終風》：「終風且曀，不日有曀。寤言不寐，願言則嚏。」鄭《箋》：「言，我；願，思也。嚏讀當爲不敢嚏咳之嚏。我其憂悼而不能寐，女思我心如是，我則嚏也。」至今當人們忽然打起噴嚏時，就會說「有人在想我」或「有人在罵我」，屈先生指出這種習俗在《詩經》就有記載。

2. 指虹

《詩・鄘風・蝃蝀》：「蝃蝀在東，莫之敢指。女子有行，遠父母兄弟。」毛《傳》：「蝃蝀，虹也。夫婦過禮則虹氣盛，君子見戒而懼諱之，莫之敢指。」鄭《箋》：「虹，天氣之戒，尚無敢指者，況淫奔之女，誰敢視之。」先生認爲首二句應爲「興體」，與下文無關。且在內地各處都有以手指虹會對身體有不好的影響，如手指會爛、手會歪、使人駝背等民俗說法，可爲此二句之的解。

3. 下莞上簟

《詩・小雅・斯干》：「下莞上簟，乃安斯寢。」鄭《箋》：「莞，小蒲之席也，竹葦曰簟。」先生指出日本的「榻榻米」（たたみ）就是這種習俗的遺留，榻榻米外面精緻的席子，就類似簟；裡面粗糙的稻草，就類似莞。雖然榻榻米的做法，和下莞上簟稍有不同，但大體上是相似的。先生並指出日

68 《屈萬里先生文存》將先生論民俗之文章列入「雜文」類，當亦是因其篇數不多，且未形成一定體系之故。

69 因屈先生搜集之民俗資料，不全爲解經之用，有些只是以備參考而已。又此處之分類乃大略區分，其中或有兩可者，擇其側重之義爲歸類依據。所舉各例具見先生原文，亦有重複見於多篇文字者，爲省篇幅，不再一一注明出處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本人的「跪坐」也正是中國古代的坐姿，舉甲骨文與金文的「女」及「母」字字形爲證。

4. 織貝

《尚書・禹貢》：「厥篚織貝。」《史記・夏本紀》《集解》引鄭康成曰：「貝，錦名也，《詩》云：『成是貝錦。』」認爲「織貝」是織有貝形花紋的錦；《僞孔傳》則將織、貝分開解釋。先生指出二者均有所不妥，織貝應該類似臺灣原住民的飾物「珠裙」，就是將貝殼打碎，磨成圓形顆粒，中間穿洞，用細線把這些貝粒一串一串的串起來，再織成布狀，作成裙子或批肩等。先生並同意日本人尾崎秀眞（1874-1952）《臺灣四千年史の研究》[70]一書中，認爲珠裙就是織貝的說法。

5. 案，舉案

《周禮・考工記・玉人》：「案十有二寸，棗栗十有二列。」鄭《注》：「案，玉飾案也。」先生指出：這種案是進食用的案，可以用手捧著，《後漢書・逸民傳》記載孟光「舉案齊眉」以奉梁鴻的故事，其中的案，也正是這種食案。至今日本人的「御膳」（ごぜん）仍是將一人份的飯菜、餐具一起放在一個漆盤中，供客人食用，就是這個習俗的延續。

6. 其他

屈先生在臺灣，特別注意到原住民（昔稱高山族）的某些習俗或事物，可與經典記載相印證，如《周易・繫辭傳下》：「刳木爲舟，剡木爲楫。」刳木就是原住民的「獨木舟」；《春秋・隱公五年》：「春，公矢魚於棠。」臺中的能高山區原住民還有射魚的習俗；《禮記・曲禮下》：「鄰有喪，舂不

[70] 尾崎秀眞，號古邨、白水，日本岐阜縣加茂郡西白水村人。初任東京報知新聞記者，後轉任《臺灣日日新報》主筆，在職二十五年。曾兼總督府囑託，及私立臺北中學校長，並投身臺灣之考古學研究，爲著名之漢學家，亦爲「南雅社」成員。尾崎氏對臺灣地方文史之整理，古蹟之維護，不遺餘力。曾舉辦「臺灣三百年文物展覽」，觀賞者近萬人，影響頗深。著有《臺灣四千年史》、《鳥松閣漢詩集》，臺北龍山寺及孔廟皆有其墨跡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相。」《荀子・成相》及《周易・井・象傳》「君子以勞民勸相」中的「相」，就是原住民的「杵歌」等等。

（二）與「動物」有關的習俗

1. 牝雞司晨

《尚書・牧誓》：「古人有言曰：牝雞無晨！牝雞之晨，惟家之索。」先生指出：民俗以母雞在早晨鳴叫爲不祥，要將此鳴叫的母雞「梟首示眾」。而其起源在《尚書》中就有記載，至今已有二千多年歷史了。值得注意的是：此俗在內地已經失傳，至先生 1949 年來臺後，才在臺北市近郊溫州街一帶（當時還是人煙稀少的郊區）看到有用竹竿夾母雞頭的事。

2. 鴞鳴

《詩・陳風・墓門》：「墓門有梅，有鴞萃止。夫也不良，歌以訊之。」鄭《箋》：「鴞，惡聲之鳥也。梅之樹，善惡自爾，徒以鴞集其上而鳴，人則惡之。」先生指出民間向以聽聞貓頭鷹（即鴞，亦作梟）之夜鳴爲不祥，由《詩經》所載來看，也有兩、三千年歷史了，並引《晏子春秋・內篇・雜下》「景公爲路寢之臺」及《說苑・談叢》「梟逢鳩」等故事爲證。

（三）與「語音」有關的習俗

1. 棗與栗

《儀禮・士昏禮》：「婦執棗、栗，自門入。升自西階，進拜，奠於席。」屈先生先引《國語・魯語上》「夫婦贄不過棗、栗，以告虔也」做解釋，並舉出山東舊式婚禮有一個節目叫「撒帳」爲旁證，就是由新郎的本家嫂子或表嫂們，拿著棗和栗子，灑在新夫婦的床上，口裡還唸唸有詞，多半是祝福新夫婦早生貴子之類的話語。老年人還說：「棗是表示早，栗子是表示立子，也就是早早立子的意思。」可知這是以同音聯想而來的吉祥話。

2. 五月子

在山東、江蘇的民間傳說，都有五月初五生的兒子不吉祥的說法。屈先生指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出這種說法在《史記・孟嘗君列傳》已經出現，《論衡・福虛》及〈四諱〉等篇也有類似記載，《史記索隱》云：「俗謂五月五日生子，男害父，女害母也。」但這個傳說的根源是什麼？古人並未說明。屈先生認爲是同音字的附會，因爲五音同午（《說文》：「五，五行也，从二，陰陽在天地間交午也。」），午又和牾（或作忤、仵、迕）同音同義，《說文》：「午，牾也。」《禮記・哀公問》：「午其眾以伐無道。」鄭《注》：「午其眾，逆其族類也。」可知午字可作「忤逆」解，五月五日生的孩子，可說是「雙料忤逆」，自然有危害父母的可能了。古書中同樣因同音字而產生的附會，還可以舉出如《史記・張耳陳餘列傳》中的「柏人者迫於人也」；《儀禮・少牢饋食禮》：「日用丁巳。」《周易・革・卦辭》：「巳日乃孚。」〈六二爻辭〉：「巳日乃革之。」等之「巳」與「改」古音相同，故「巳日」即「改日」，「改日」即「革日」——變革之日等。

由屈先生所撰考證民俗的各篇文章來看，有幾項特色值得注意：

（1）從青年時期就已開始關注民俗問題，反映了屈先生的學術敏銳度。

（2）充分配合運用民俗以外的各種知識，符合當前研究文史學科的精神。

（3）用民俗來解釋經義，突破古代解經的藩籬，頗具說服力。

屈先生之所以注意到民俗資料對解經的重要性，一方面可能和其喜歡研究《易經》有關，另一方面也可能受到民初學風的影響。〈《書傭論學集》序〉云：

> 那時（1922）疑古的浪潮已經很普遍，而我的觀念則是信古彌篤。……直到在山東圖書館服務了三四年之後，才知道研治《周易》不能專靠古人的注解，而必需參考其他的比較資料。於是除了泛覽先秦的典籍之外，也開始注意考古學和民俗學等類的文獻。……也讀了不少金文書籍，……到這時我才知道注意探討學術資料的眞僞，以及產生的時代等問題。[71]

屈先生運用民俗觀點研究《詩經》的問題也很深入，其〈論國風非民間歌謠的

[71] 〈《書傭論學集》序〉，《屈萬里先生文存》第 4 冊，頁 1330-1331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本來面目〉[72]一文，在論國風的篇章形式與民間歌謠不同時，即引用了北平、川東等地的民歌，證明原始的民間歌謠應該是長短字數都是不整齊的，今傳《詩經》中的國風部分，應該經過貴族或士人潤飾修改。

五、結　論

由本文的分析可知，屈先生的經學、史學成就，都是築基於深厚的文獻學基礎，並且從屈先生的學術歷程可以發現，屈先生的文獻學功力，與其長期服務於圖書館界有關。

屈先生與圖書館的淵源，從青年時代就開始了。先是民國十八年（1929），東魯中學尚未畢業，屈先生就曾擔任過其家鄉山東省魚臺縣立圖書館的館長，時年 23 歲。至民國二十一年（1932），因欒調甫先生（1889-1972）[73]的介紹，進入山東省圖書館，從館員做到編藏部主任；民國二十九年（1940），屈先生又因李青選先生（1897-1978）[74]之介紹，進入中央圖書館特藏組，以編纂名義，負責管理善本書；民國三十四年（1945）起，擔任特藏組主任。民國五十五年（1966），因蔣復璁先生（1898-1990）轉任故宮博物院院長，教育部委任屈先生接掌中央圖書館館長一年多。總計屈先生前後在圖書館界十九年，不但因此自號「書傭」，也從而培養出對於圖書文獻愛護珍惜的熱情，更提出建設臺灣成爲世界漢學研究重鎮的呼籲。[75]

---

[72] 〈論國風非民間歌謠的本來面目〉，《書傭論學集》，頁 194-215。

[73] 欒調甫，字廷梅，山東省蓬萊縣人，近代著名《墨子》學者。曾任齊魯大學教授、山東省文史研究館館長，著有《墨經校釋》、《說文解字補正》、《齊民要術考證》、《墨學研究論文集》等。

[74] 李青選，名毓萬，山東省博山縣人，民國後歷任財政部參事、顧問等職，因曾長期追隨孔祥熙（1880-1967），熟知中國近代財經史實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存有其口述歷史。

[75] 參見劉兆祐：〈屈翼鵬先生與國立中央圖書館〉，《屈萬里先生文存》第 6 冊，頁 2170；〈屈翼鵬先生對中國圖書館事業的貢獻〉，《屈萬里先生文存》第 6 冊，頁 2191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進一步綜觀屈萬里先生對於古籍文獻的研究成果，與其學術經歷、治學方向密不可分。服務於圖書館界，典藏整理善本圖書長達近二十年的經驗，使屈先生在版本鑑別、目錄編纂方面有過人的眼光與學力，但屈先生並非狹義的「版本賞鑑家」，而是將版本、目錄的知識廣泛運用於研究學問，從而建立起「以學術資料眞僞考辨爲主軸」的學術體系。同時，由於深入研究《周易》、《詩經》，注意到考古資料、民俗資料的重要，開啓「科際整合」研究的新視野。多次出國講學，也促使屈先生注意到國際漢學研究的情況，引發研究學術需要知道「學術行情」（也就是培養國際觀）的見解。[76] 這些在現在看起來已並不罕見的觀點，屈先生卻早在五、六十年前，還在所謂「戒嚴時期」就已經一再大聲疾呼了。這對後學者探尋人文典範，借鏡前人智慧的學習歷程而言，是非常值得推崇的榜樣。

（責任校對：傅凱瑄）

引用書目

一、傳統文獻

漢・戴聖輯，鄭玄注，唐・孔穎達正義：《禮記》，臺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80 年影印清・十三經注疏本。

劉宋・范曄撰，民國・盧弼集解：《後漢書集解》，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78 年景印本。

北魏・酈道元注，清・戴震輯校：《水經注》，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74 年排印本。

76 〈北美各大學所藏的中文圖書和著名的漢學家〉，《屈萬里先生文存》第 3 冊，頁 1119-1126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宋・江少虞編：《宋朝事實類苑》，臺北：源流出版社，1982 年標點本。
清・顧炎武：《日知錄》，臺北：明倫出版社，1974 年景印本。
清・紀昀等：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 年景印清武英殿本。
清・張之洞撰，民國・范希曾補正：《書目答問》，臺北：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1984 年排印本。
清・楊守敬、熊會貞：《水經注疏》，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89 年排印本。
清・葉德輝：《書林清話》，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76 年排印本。

二、近人論著

＊丁傳靖輯：《宋人軼事彙編》，臺北：源流出版社，1982 年。
山東省圖書館編：《屈萬里書信集・紀念集》，濟南：齊魯書社，2002 年。
＊王國維：《古史新證——王國維最後的講義》，北京：清華大學出版社，1996 年。
林慶彰：〈屈翼鵬先生的詩經研究〉，《中國書目季刊》第 18 卷第 4 期（1985 年），頁 178-191。
朱孟庭：〈經典的文化詮釋——論聞一多《詩經》的婚嫁民俗闡釋〉，收入《第四屆文學與資訊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臺北：國立臺北大學中國語文學系，2008 年，頁 70-82。
＊何淑蘋：〈近三十年屈萬里研究論著目錄〉，《書目季刊》第 43 卷第 2 期（2009 年），頁 99-121。
何淑蘋：〈臺灣經學的領航者——屈萬里先生〉，《山東圖書館學刊》2009 年第 3 期（總 113 期），頁 110。
屈萬里：《讀易三種》，收入《屈萬里先生全集》第一種，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1985 年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＊屈萬里：《先秦文史資料考辨》，收入《屈萬里先生全集》第四種，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1983 年。

屈萬里：《漢石經尚書殘字集證》，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四十九，1963 年，收入《屈萬里先生全集》第十種，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1985 年。

屈萬里：《漢石經周易殘字集證》，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961 年排印本，收入《屈萬里先生全集》第十一種，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1985 年。

屈萬里：《古籍導讀》，收入《屈萬里先生全集》第十二種，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1983 年。

＊屈萬里：《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》，臺北：藝文印書館 1975 年排印本，收入《屈萬里先生全集》第十三種，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1983 年。

屈萬里：《書傭論學集》，臺北：開明書店，1969 年排印本，收入《屈萬里先生全集》第十四種，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1983 年。

屈萬里：《漢魏石經殘字》，山東省立圖書館 1943 年鉛印本，收入《屈萬里先生全集》第十五種，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1985 年。

屈萬里：《屈萬里先生文存》第一至六冊，收入《屈萬里先生全集》第十七種，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1985 年。

屈萬里、昌彼得、潘美月：《圖書版本學要略》，臺北：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，2005 年修訂本。

＊徐憶農：〈屈萬里先生版本目錄學成就〉，《山東圖書館學刊》2009 年第 3 期（總 113 期），頁 128-130。

高　亨：《詩經今注》：臺北：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1984 年。

彭　飛：〈著名版本目錄學家屈萬里先生和我國圖書館事業〉，《四川圖書館學報》1994 年第 6 期（總第 82 期），頁 58-61。

張舜徽：《中國文獻學》，鄭州：中州書畫社，1982 年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＊張國淦：《歷代石經考》，收入《歷代石經研究資料輯刊》第 4 冊，北京：北京圖書館，2005 年。

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、國家圖書館編印：《屈萬里先生百歲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2006 年。

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：《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系史稿 1929-2002》，2002 年。

劉兆祐：《屈萬里先生年譜》，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2011 年。

＊劉兆祐：〈屈萬里先生之文獻學〉，《國家圖書館館刊》93 年第 2 期（2004 年），頁 1-25。

＊聞一多：《古典新義》，臺北：育民出版社，1981 年。

鍾珮煖：〈三重證據法的運用——《左傳》「少昊以鳥名官」爲鳥圖騰說之商榷〉，《花蓮教育大學學報》第 22 期（2006 年），頁 39-54。

羅孟幀：《中國古代目錄學簡編》，臺北：木鐸出版社，1986 年。

＊蘇　精：《近代藏書三十家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9 年。

顧頡剛著，王煦華編：《孟姜女故事研究集》，臺北：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1985 年。

顧頡剛主編：《古史辨》第一至七冊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2 年重印本。

（**說明**：書目前標示＊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）

Selected Bibliography

Ding, Ch.-J. (1982). *Song ren yi shi hui bian* [The collected anecdotes in Song Dynasty]. Taipei: Yuan-Liu.

He, Sh.-P. (2009). Bibliography of research on Qu Wan-li in the last 30 years. *Bibliography quarterly 43(2)*, Taipei: Shu mu ji kan she.

Liu, Zh.-Y. (2004). The philology of Qu Wan-li. *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Bulletin*, *2*, 1-25.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Qu, W.-L. (1983). *Xian Qin wen shi zi liao kao bian* [Criticism of pre-Qin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]. In *Qu Wan-li xian sheng quan ji* [The complete works of Qu Wan-li] (Vol. 4). Taipei: Linking Publishing Co.

Qu, W.-L. (1983). *Pu lin si dun da xue ge si de dong fang tu shu guan zhong wen shan ben shu zhi* [A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rare books in the Gest Collection of the Princeton University East Asian Library]. In *Qu Wan-li xian sheng quan ji* [The complete works of Qu Wan-li] (Vol.13). Taipei: Yee-Wen.

Su, J. (2009). *Jin dai cang shu san shi jia* [Thirty book collectors in modern China]. Beijing: Zhonghua Book Co.

Wang, G.-W. (1996). *Gu shi xin zheng: Wang Guo-wei zui hou de jiang yi* [New evidence for ancient history: The last lectures of Wang Guo-wei]. Beijing: Chin-Hua University.

Wen, Y.-D. (1981). *Gu dian xin yi* [New meanings of the Classics]. Taipei: Yu-Ming.

Xu, Y.-N. (2009). Bibliology and achievement of Qu Wan-li. S*handong Library Quarterly*, *3*, 128-130.

Zhang, G.-G. (2005). *Li dai shi jing kao* [Research on the stone classics of various dynasties]. In *Li dai shi jing yan jiu zi liao ji kan* [A collection of studies on Stone Classics of various dynasties] (Vol. 4). Beijing: Beijing Library.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